

读者参考

丛书

79

回望改革

◎世界经济变局中的中国地位

◎群体情绪与投资机会 ◎婚姻和遗传上的男女差异

◎姜文与新生代 ◎捂盘、借贷和第二套住宅

◎当我们遭遇温饱——贵族文化与大众文化

DU
ZHE
CAN
KAO
CONG
SHU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望改革/《读者参考丛书》编辑部编.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2

(读者参考丛书:79/林雨主编)

ISBN 978-7-80730-506-4/Z·20

I. 回… II. 读… III. 文摘—中国 IV. Z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9349 号

本书资料除编者据各种资料汇编而成的文字以外,所用图文资料均标明出处及作者。转录图文均酌付稿酬。有未及奉达者,请即与我编辑部联系。

回望改革

读者参考丛书(79)

2008 年 2 月出版

编辑:《读者参考丛书》编辑部

执行主编:林 雨

责任编辑:天 水

封面设计:周剑峰

出版:学林出版社 地址: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邮政编码:200235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邮购:学林出版社读者服务部

地址:上海文庙路 120 号

邮政编码:200010

印刷:丹阳市兴华印刷厂

印张:8

字数:28 万

ISBN 978-7-80730-506-4/Z·20

定价:10.00 元

欢迎您预订 2008 年度 《读者参考丛书》

《读者参考丛书》每辑 8 印张,约 28 万字。全年共出版 6 辑,逢双月出版。

2008 年度的《读者参考丛书》定价每辑 10 元,全年共 60 元。全年预订邮购者免收邮资。需挂号邮寄者另收邮资 18 元(全年)。欢迎读者直接向本社读者服务部办理预订。

学林出版社读者服务部

邮政编码: 200010 电 话: 021-63779027

地 址: 上海文庙路 120 号 联系人: 郑建华 张 玲

账 号: 工行中华路支行

1001219719300006933

《读者参考》征订回单

原户号:

年 月 日

编号 _____

户号 _____

书 刊	订阅份数	单 价	金 额	合 计
读者参考		60.00		
金额(大写)	千 百 拾 元 角 分	订 阅 单 位 盖 章		
订阅单位				
地址				
邮编				

注:此联填妥后请寄我部;本单复印填写有效

读者参考丛书

(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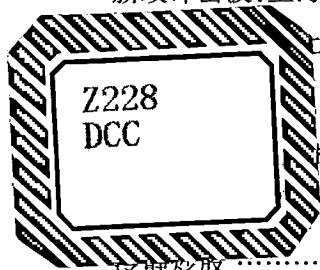
回望改革

回望改革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目录

院长温铁军访谈	1
中国经济可能出现的问题	6
经济结构央企化有碍民生	9
世界经济变局中的中国地位	12
气候问题为什么会成为外交热点	14
为什么“大地主”是中国首富	16
开放的中国金融市场	17
流动性过剩	20
农民为何不抱怨房价	22
租房七十年	25
开发商何以能够囤积土地	27
新政冲击波：上海楼市样本	28
二套住宅	32
机会	34
——牛市骗术揭底	40
股市抄底	45



Z228
DCC



温州人的二十年投资理财思路	49
---------------------	----

委托理财中的误区	53
----------------	----

巨富共有的九大气质	55
-----------------	----

滚滚“单身潮”	57
---------------	----

婚姻和遗传上的男女差异	60
-------------------	----

郭树清：半个银行家	64
-----------------	----

佐利克：世界银行新行长	68
-------------------	----

还原一个真胡适	
---------	--

——专访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

主任黄克武	71
-------------	----

张学良品评人物	77
---------------	----

爱的遗赠	82
------------	----

善良是一种能力	102
---------------	-----

老井	11
----------	----

恬淡的智慧	197
-------------	-----

一个农民的纯收入	58
----------------	----

调查中国生活真相	83
----------------	----

解读白领阶层的心理危机	89
-------------------	----

内地艺术品拍卖十五年	93
------------------	----

网上银行，半是欢喜半是忧	96
--------------------	----

专家叫板专家潜规则	101
-----------------	-----

关于教育的人文素质	103
艺术教育何以成为鸡肋	107
漫谈美国人的幽默感教育	110

从雅典奥运会中学习人文和节俭	109
“美丽的意外”造就温布尔登网球赛 传奇	113

闲话李安	87
姜文和新生代:电影审查是问题吗?	117
苏菲·玛索们的中年危机	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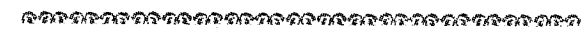
速写音乐名人	129
海顿的交响曲	138
艾森巴赫:音乐可以永远存在	135
谭盾的“音乐加法”	132

作协来了一帮年轻人	140
其实我根本就不叛逆:韩寒访谈	2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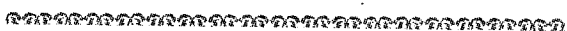
阅读新趋势与中国出版业的发展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答《学习时报》

记者问	142
当代青年阅读四大趋势	148



如何守护我们的心灵底线	150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激烈争论	152
张治中：我与共产党	156
有关金钱与快乐的沉思	165
当我们遭遇温饱——贵族文化与 大众文化	170
两个常常用错的词	177
为短命的历史课本致哀	180
“雅量”与法治	176
谁来保护你的隐私	125
生态困境与“精神污染”	182
即将消失的名胜	188
国人科学素养调查	191
科学无法解释的十大神秘现象	195
额尔古纳：中国最后一块绿色净土	168
茅台酒的不可复制：“天”、“人”纠葛	198



香港院士的“特权”	201
爱在此,乐在此	
——感性说香港	203
中国的“Q一代”	209
中西文化最常见的九大差异	146
欧洲新感觉	216
非洲大陆与欧洲文明	
——历史学家埃利基亚·姆博科罗	
一席谈	211
美国式贫困	54
美国的市长	67
你所不知道的法国	207
走在钟表上的德国人	39
日韩:口福的成本	220
动荡的巴基斯坦	225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建设提速	228
告别“收费政府”还有多远	232
限制公车才是汽车时代的真问题	223
警惕外资依赖症	95
我的健康食谱	234
出国旅游与健康	161

生命中的五个魔鬼时刻	248
辨别体质吃水果	99
谁偷走了你体内的营养	179
全球 40% 死亡与污染有关	31
老年痴呆与受教育程度有关	24

茶道	222
文人说酒	235
真正的大师	238
中国人的“想当然”	21
海盗们的法典	210
出境公民可获哪些领事帮助	76

今日说法	5、8、13、19、26、48、 56、70、92、106、112、116、 131、151、155、175、187、202
------------	--

封面图片 背影
摄影 舒 音

MULU
HUIWANG
GAIGE
DUZHE
CANKAO
CONGSHU(79)

回望改革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
温铁军访谈

□阳 敏

城市和农村的不同选择

《南风窗》：毋庸置疑，早期的改革是多数人受益的改革；而在叙述早期的改革经验时，人们总要以“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带有神话色彩的故事开头。在您看来，农村大包干的实质是什么？它所起到的制度变革的意义又在哪里？

温铁军：大包干的结果，是传统的恢复。我曾经多次讲过，大包干所造成的农村经济基础不外乎是“传统的小农经济+村社制”，其财产和分配关系则是“土地均分制加定额租”。至于报刊杂志怎么宣传，我不过一介穷儒，大可不必去考虑，只是应该尽责地把问题的实质讲清楚。

不过，在80年代初期，出于回避意识形态制约的需要，确实不能直白地说这样的大实话。在杜润生老先生90寿辰的座谈会上，陈锡文回忆起他1984年参加中央一号文件起草时在京西宾馆的电梯里向杜老请教，为什么文件语言非得这么拗口？杜老告诫他，中央文件上这

种对于大包干的表述，“少一个字都是要掉脑袋的”。

大包干在制度变迁上的积极意义，在于把过去以人民公社的名义、但实际是国家资本控制农村土地的这种中国工业化原始积累时期最为基础的财产制度，变成了两亿农户依据社区内部的成员权平均占有自己社区的土地。其实，这恰恰是“起点公平”的自由主义改革核心理念的体现。如同土改一样，是使得当时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都得到好处的一种改革。

《南风窗》：上世纪80年代常讲改革也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事实上，农村的改革经验对城市改革有借鉴意义吗？

温铁军：当年胡耀邦总书记在分析农村改革经验的时候，曾经主张“包”字进城，但并没有明确指出农村改革其实是对财产进行重新分配。当年，城市企业改革实行承包制之中很多演变成少数人获取企业资产收益的“权力承包”。

早在1998年我在《工人日报》上发表的纪念改革20年的整版文章的第一段就开宗明义地揭示过

了：农村改革之所以成功，在于这是一个让大多数农民都得到好处的改革。城市改革之所以至今延宕不前，是因为没有让大多数工人得好处。农村改革是把财产平均分给农民，而城市改革并没有把财产权益给工人，也就是说，城市改革是大多数工人失去财产的改革。城市的保障功能并不由财产来体现，而是由政府二次分配来体现。这是城市改革自从提出以来到现在仍然不断造成社会代价的一个更真实的本质原因。但让农民承包土地的时候，同时也实际上把农村的公共开支和福利保障一并让渡出去了。这是进入90年代之后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的一个根源。

实际上，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改革就参照了农村大包干的经验。效果还是不错的。中国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不出现在城市，而是在1984年全面推进大包干的农村——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长行村。这个城郊村当年就有几百万工业固定资产，村干部带领全村老百姓讨论决定：根据劳动农民的年龄、贡献、职务作股。就像各村的农民按每户人口平均分地一样，集体企业的固定资产折股到每一个社员头上，就是“股份合作制”。后来，在我们从事农村改革试验区研究的那10年，很多集体化社区和乡镇集体企业都这样操作，成为当时很成功的普遍经验。1996年，广东省曾发出文件，在全省农村

推进产生于南海市的“以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也引起了国土资源部的重视。

大量调查证明，80年代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推进的时候，反对者根本不是乡镇企业职工，不是技术人员，不是企业骨干，甚至不是企业的实际管理者，而主要是基层干部。为什么呢？如果不改制，他们最大的好处就是权力可以直接受益，一旦实行多数人有股权时，特别是当我们在改革试验区把70%以上的股份直接分配给农村群众以后，干部再想安排亲信、随便从企业提取收益还行吗？不可能了，因为大多数具有股东身份的群众盯着这件事。

话说回来，30年前农民主动改革分地的时候，干部们难道就愿意吗？当时叫“三5牌干部”反对：50多岁，50多元工资，50年代参加工作的这些基层干部大部分是反对农村家庭承包，反对农民平均占有财产。为什么呢？利益受损，权力丧失。

政府退出和重新进入的逻辑

《南风窗》：到90年代中期，三农问题已经相当尖锐了。有的说是缘于大包干所带来的制度变革效益已经发挥殆尽，有的说与实行市场经济有关系。

温铁军：我不得不说这是个规律，无论主观愿望如何，规律总是不可逆的。

第一,世界上任何一种跟进型工业化,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个规律的制约——只要后发国家加速工业化、城市化,就一定是更多地从三农提取剩余,或者说资本积累。我做的研究显示,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在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中,从绝对值来看,从农业获得的剪刀差是不断增加的,1992年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新体制以后,剪刀差的总量更是大幅度增加,这一点从图形来看就更明显。也就是说,不仅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进行原始积累的时候,要大量集中使用农村劳动力于国家基本建设,还要通过剪刀差从三农提取积累,进入市场经济阶段之后,同样如此。

第二个规律呢,只要是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来配置要素,一定是会把要素从低收益领域配置到高收益的领域。大家知道,农业是低收益的经济领域,农民收入达不到社会平均收入的水平,这就决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会把农业三要素抽走,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经济领域,在三要素净流出、而且是大量净流出的情况下,能够维持不衰败的。自从亚当·斯密以来就说,土地是娘,劳动是爹,资金是儿;如今是娘被征占爹外出,不孝儿天生地嫌贫爱富,这家就完了。这就是规律。

这两个规律都是不可逆的。规律在那摆着嘛,无论谁搞政策也不例外是怎样顺应规律而已。

《南风窗》:您最近在中国人民大学主持了一个有关基层矛盾的调研。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新的发现?

温铁军:我们的研究发现,每次宏观经济危机发生之后,都连带造成乡村治理危机。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经济危机的代价在向乡村转化。这不是人为的,也只是规律的作用。

1988年中国物价指数上涨达到18.6%,1989年出现了典型的滞胀形态的危机——生产停滞、通货膨胀,接着导致城市的消费需求下降,当然也造成对农产品的消费需求下降,也就是说城市发生的危机转变为农民现金收入下降;导致农民交不起必须用现金支付的管理成本和公共开支(比如教育、医疗等等)。农民现金支付能力下降,就导致乡村公共治理危机。乡村政府就要动员所有拿财政钱的人,到农民家里挨家挨户串门,催粮催款,导致乡村发生冲突。就这么一个构成逻辑解释的因果链条。所以,制度变迁的代价最终是由中国的内部第三世界——农村来承担的。

1988年出现的物价上涨,是我们试图一次性放开价格、“初涉市场经济汪洋大海”时出现的第一次呛水。接着,1994年到1996年,物价指数高达24%,这是初涉资本市场的(房地产、股票和期货市场)的汪洋大海出现的第二次呛水。在那两次制度变迁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危机

之后,中国至今足够一个周期的10年间,再没有出现大幅度的物价上涨。

《南风窗》:您认为农村改革实际上是政府从最不经济的农业和农村领域相继退出的结果。而2006年全面免除农业税以后,政府又重新以新农村建设的名义再次进入农业和农村,今天的重回农村与改革开放之前有什么不同?这样的举措将可能对改革发展全局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温铁军:上世纪50年代,政府进入农村经济领域的主要目的是获取三农剩余,留给生产队的只是保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那部分产品,那当然只能先按人口分配,就难免会导致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农业普遍亏损,集体债务大量增加,这时候,“公司主义”的政府当然就会选择退出。这样,就出现了农民自发回到传统小农经济的大包干。

后来,政府又有90年代的“二次退出”。第一次政府只是退出了农业生产领域,并没有从其他涉农经济领域中退出,比如说供销社、粮食部门、农业金融、农机生产等。政府从农业退出之后全面恢复小农经济当然有交易费用陡然增加的制度成本,这些政府下属的涉农部门不得不承担;于是出现了很多地方的供销社不景气、信用社亏损等情况。于是乎,在市场经济几乎成为意识形态的初级阶段,政府就从这些不经济的涉农领域中渐次退出;这就

是我所说的“二次退出”。但是,有些部门是不能完全退出的,比如农业技术、畜牧兽医等部门还有一定行政职能,也就处于半退出状态。所以,政府过去渐次退出不经济的涉农领域,对于农村经济产生了相当负面的影响,因此才有近几年的政府再次进入农村。

这次政府重新进入农村,选择的方向和重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先解决农村的公共品问题。我们叫“公共财政阳光普照”。这恰好是2002年末胡锦涛总书记讲的:要把财政新增开支主要用于县以下,解决农村基层公共开支的问题;国家支农资金主要用到村以下,解决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小项目需求。这两条,是十六大召开后就定下来的,2003年的一系列新政是按照这两条去安排的。因此,我才说这个时期的农村新政,基本上可以归纳为政府重新介入三农。农村新政重新进入的,并不是生产领域,而是进入公共服务和基本建设领域,客观上对于缓解三农问题、对于化解中国基层矛盾有着相当积极的作用。

“深化改革”所面临的真问题

《南风窗》:近两年来,有关改革的争论很多。您如何理解“深化改革”?在您看来,今天“深化改革”所面临的真问题又是什么呢?

温铁军:任何国家的改革都既有改革收益又有改革成本。成本大

于收益的,就是失败的。我们的情况在于收益与成本不对称。执政党十六大以后的改革和以往改革相比,其实是在接受了既往改革的收益的同时,试图化解以往改革带来的成本,防止改革失败的可能最终演变为事实。因此,当前是这样一种必须承担已经产生的制度成本的条件下的改革,而不是90年代的改革。那时,似乎只要改革就产生收益,于是,人们普遍认为改革是能够产生增量的。然而,即使按照这个比较通俗的说法,到90年代中期前后,这种改革带来的增量就已经很难继续产生了。

其实,到底中国改革是增量的改革还是存量的改革,长期以来是存在争议的。本来任何人都能看到,无论大包干“分地”,或者国企和乡镇企业的股份化改革“分产”,还是90年代末期全国范围推进的住房货币化改革“分房”等等,哪个不是在触动社会资产存量?此外,自从80年代改革以来三次经济高速增长与三次大规模征占土地完全同步!这些,难道不是涉及财产关系的变革,不是“触动存量的改革”?

既然任何动存量的改革都当然

要产生社会代价,而这个代价却从来不由获取改革收益的强势利益集团承担,那就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演化成为社会问题的复杂化,甚至尖锐化。那我们还能不能决然地说,现在的社会问题不是这种“存量改革”带来的呢?由此看来,只有像我们在80年代大包干之后曾经强调过的“改革所解决的问题,远不如它带来的问题多”,认真地讨论以往的改革带来的新问题,才能进一步深化“能够让收益和代价对应”起来的改革。

现阶段仍然是“市场经济初级阶段”。需要讨论的“真问题”,也许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资源与人口关系过度紧张长期化的条件下,如何为了可持续而改变跟进式发展主义的命运挑战。另一个是中产阶级的社会责任与劳工的权益保障如何对立统一的问题。要推动中国近代史上从来没有条件成熟过的、至今被很多宵小帮闲们忽悠着的、但整体仍然蹒跚于“自在”阶段的中产阶级逐渐向自觉的阶段进步,至少部分地承担起社会稳定条件下中国人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责任。

(摘自《南风窗》)

今日说法

如果不还我一个清白,我病不看了,进京告状!

——躺在病床上的河南省财鑫

集团掌门人仵树仁怎么也没有想到,在被评为河南“十大风云豫商”两个月之后,他又获得了“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的“五大反角”之一的提名。

中国经济可能出现的问题

[美] 摩根斯坦利

最新经济数据 displays 了中国经济的旺盛状态,并为我们对中国经济的乐观判断提供了支持。然而,我们与其品味这些令人惊叹的数据,倒不如考虑中国经济可能出现哪些问题。

第一种情形: 外需大幅下滑

中国本轮经济周期中,出口一直是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中国从全球化中获得的经济利益超过了任何国家。自 2001 年底加入 WTO 以来,中国出口年均增长 30%,增速比 1997~2001 年间的 12% 翻了一番有余。2007 年上半年,出口同比增长了 28%。按我们的估算,目前出口已占 GDP 的 40% 以上。

既然中国经济如此依赖外需,也就尤其容易受到外需大幅下滑的影响。多种事件都可能造成下滑,比如,美国经济硬着陆,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间的全面贸易战,或恐怖袭击、自然灾害等阻断了正常的贸易和资本流动渠道。

外需大幅下滑将导致出口增速暴跌。这种情况下,中国厂商势必要在国内市场中销售产品。国内市场中供给的猛增将导致价格下跌,甚至可能使中国经济陷入通货紧缩。近年来,中国曾两次陷入通缩,第一次是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第

二次则是在纳斯达克股市泡沫破裂后。这两次通缩要么是和出口下滑同时发生,要么是在其后立即出现。

如果外需的低迷持续下去,中国经济受到的损害将更加严重。在外需强劲的情况下,中国的“产能过剩”只是一种趋势,而非实际情况,因为过剩产品转化成了贸易顺差。然而,如果外需大幅下滑,而后续持续疲软,那么中国的产能和投资过剩问题就会暴露出来,不良资产和不良贷款将迅速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体系将面临严峻考验。为保证财务健康,银行将提高贷款标准,放贷将更加谨慎。因此,这种不利的外部冲击将通过银行信贷渠道传输到经济的其他层面。

第二种情况:股市破裂

如果银行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渠道受到股市的很大影响,那么股市的大幅调整就可能严重损害银行的财务状况。这种情况下,为了确保资产质量,并满足相关的谨慎性要求,预计银行会提高贷款标准,从而导致银行贷款的总体收缩。因

此,银行的信贷渠道将会放大股市下跌的影响,从而大大增加投资、消费等实体经济部门受到的影响。鉴于银行在中国金融体系之中的支配性地位,情况就更严重。

零星证据显示,自2006年年中A股市场启动以来,一些居民通过抵押贷款等常规个人贷款增加了负债,用借到的资金投资于股市。由于股市投资的潜在回报率远高于传统投资方式,因此除居民之外,一些企业可能也把银行借到的资金投入了股市。而且,一些企业还可能一方面把自有资金投入股市,另一方面却向银行增加借款,用于“合法”的投资。这样,银行也会间接受到股市的影响。

然而,由于数据不足,任何关于股市对银行影响程度的估算基本上都是猜测,因此,我们不去进行这样的猜测,而是根据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大银行的公开数据进行压力测试,从而揭示相关的风险。首先,我们假设2006年6月股市启动以来的新增银行贷款中,有一部分已经通过各种方式进入了股市。其次,我们假设股市泡沫破裂将使这部分新贷款成为不良贷款,从而迫使银行注销相应价值的资本。这将会打击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并可能使之降至监管部门的最低要求之下。这种情况很可能会促使减少其他贷款,从而引发信贷紧缩。

目前,这些大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约为9%左右,远高于监管

部门4%的最低要求。然而,据我们估算,如果2006年6月~2007年6月间的新增贷款中有30%已进入股市,而又因股市大跌而成为不良贷款,就有可能使那些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降至4%以下,从而引发信贷紧缩。目前,30%新增贷款进入股市的假设比例看起来似乎不高,但如果股价继续迅速攀升,那么这将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假设。

第三种情况: 宏观政策的失误

2003年以来,中国连续4年保持着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而2007年,将再次创下两位数的增速。但在过去,中国经济增长具有一个特点:经济活动和通货膨胀总会出现周期性的高涨和下滑。

我们认为,这种大起大落型经济周期的部分原因在于政策失误。1986~1990年的经济周期的开端是,中国担心前一个周期的紧缩政策造成了国企的困难,因此在1988年政府换届之前放松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于是,1988年的通胀率升至19%。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采取了严厉的行政性举措,从而使固定资产投资和GDP增长在随后几年中出现硬着陆。

1991~1997年的周期开始于政府支出的增加和银行信贷政策的失误。到政府换届之前的1992年,中国已经出现投资热潮。强劲的需求压力导致通货膨胀,而食品价格

的放开和政府部门工资的上调更加大了通胀压力。到2003年年中,政府采取应对措施,通过全面的政策组合为经济降温,其中包括加息、直接控制银行贷款以及加强行政性控制等。然而,在1993年末,宏观调控出现了暂时的逆转,加之1994年人民币贬值,导致当年出现了24%的高通胀。虽然中国最终实现了软着陆,但1992~1996年间迅速增长的银行贷款却导致了庞大的不良贷款,从而削弱了银行体系,直到各大国有银行接受注资、进行重组才得以扭转局面。

然而,上述大起大落型经济周期再现的可能性却不像过去那么大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宏观管理能力进步明显。因此,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固定资产投资等关键宏观变量的波动性有所下降。第二,中国经济的开放度大为提高,集权程度明显下降,私人部门的作用大为增强。这些变化将会削弱严厉的行政性举措对经济的影响,因此与过去相比,

政策变化引发的经济调整将会更为有序。第三,看起来中国政府更愿意采取预防性行动,以提前消除刚刚暴露的经济问题。关于这一点,一个证据就是,经济中刚刚出现过热迹象,政府就采取了新一轮宏观紧缩举措。

除了上述三种情形之外,中国问题专家似乎还普遍担心,2008年奥运会之后,中国经济将会急剧减速,就如同其他奥运会举办国的情况一样。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奥运会之前,举办国总会出现与此相关的投资热潮。而奥运会结束之后,相关活动就会迅速停止,从而导致经济衰退。但我们认为,北京奥运会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不会像许多人担心的那样严重,因为相对于中国的GDP和人口而言,北京只是一个“小”城市,其GDP和人口份额分别为4%和1%左右。因此,北京在奥运会领域的巨额支出很可能会对当地经济产生巨大影响,但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却不会很大。

(摘自《社会科学报》)

今日说法

雷锋挺平常的,他只是一个凭良心做事的人,这样的人不应该只有一个,每个人都应该做得到的!

——丁大卫和卢安克两位“洋雷锋”在被人夸为雷锋时如此表示

世界上只有没出息的人,没有没出息的工作。再完美的设计,也需要技术工人才能加工成产品。别人加工不了,你能够做出来,做得好,你就是顶呱呱的人才。

——“全国技术能手”苗俭上技校时老工人对她的教诲